

埃·莫兰敲响西方文明的警钟

沈大力

爱丽舍宫的不明飞行物

“文明政治”成了法国今岁热门话题。现任总统萨科奇在 2008 新年致辞里宣布，他立意推行一种“文明政治”。总统特别顾问盖诺称这是一次“新文艺复兴”，要从长远考虑，触及社会深层，强调政治的“理智与伦理”层面，摆脱单一靠技术管理的经济体制，以应对当今社会的紧迫事态和危机，为法国新政定下了基点。他向《费加罗》杂志记者阐明：“何况，这不仅仅适应法国社会的情况。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处不平等加深、生态危机、特性萎缩和宗教冲突。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法国社会恢复活力，处处都用智慧孕育未来。”

“文明政治”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 (Edgar Morin) 于 1997 年在其著作《向着文明政治》(Pour une politique de civilisation) 里提出的。萨科奇总统承认其来源，特邀请埃德加·莫兰到爱丽舍宫长谈，说明他是出于法国的价值观和民族特性考虑问题(???)，想争取得到这一概念倡导者的认可。莫兰肯定对方的诚意，但强调自己的理论缘于西方文明的进程日益显露严重负面影响，范围要更广泛、深远得多，非一般政要所能透彻理解，更谈不上切实贯彻。他在作客爱丽舍宫后向报界表示：“如果萨科奇能促进人们思考一项新的政策，不单纯追求消费，而更注重改善生活质量，那总还是件好事。”十分明显，政界人士出于现实政策需要，学者则偏重文明的科学性。这之前，埃德加·莫兰的书颇得绿党人士青睐，社会党总统竞选候选人罗亚尔女士亦曾在电视节目中晃动它，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增添新意。但总的说来，莫氏哲理在本国一直被漠视，当成一件“不明飞行物”。相反，他的思索方法及其对当今世态的思考已引起欧洲政界关注。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普罗迪向他请教，以确定教育改革纲领；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提议给他西班牙国籍，以表敬意。他在地中海国家和韩国、日本享有盛誉，影响波及拉丁美洲，广泛传播。墨西哥一所大学以他命名，致力于“培养意

识清醒的公民”，秘鲁有好几个莫氏理论研究中心，艺人歌颂他“头脑里充满诗意、爱情和智慧”。现今，人们公认埃德加·莫兰是一位涉略（???)社会学、哲学、人种学、文学，兼物理学、生物学的“全球思想家”。他现今担任着教科文欧洲文化学社主席和《传播》杂志社社长，虽年迈仍在为人类的境遇奔走呼吁不息。

希西弗的轨迹

埃德加·莫兰 1921 年生于一个西葡犹太人家庭，自幼丧母，吮吸忧郁的乳汁，孕育一种救赎感，及长阅读兰波、陀思妥也夫斯基、法朗士的作品，尤其是马尔罗的《希望》，同时接受马克思的理论，欣赏其集经济、历史和哲学于一身的跨学科性和人类解放思想，遂加入法国共产党，二战时投身反纳粹斗争，成为密特朗所辖地下抵抗组织的重要成员，跟玛格丽特·杜拉斯夫妇一起组成巴黎“伯努瓦街小组”核心，迎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

战后，匈牙利劳动党领导人兼外长拉吉克被控有铁托倾向遭枪决，埃德加·莫兰深受震惊而“心碎”。1951 年，他因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无端被法共开除，经历了一番失去大家庭的痛苦。继而，他投入人文科学的跨领域研究 1961 年开创“当代社会学”新领域，为 1968 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先造声势。他也是凛斥（???)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殖民主义野蛮行径的法国著名学者之一。八十年代初，莫兰跟米歇尔·塞勒、勒内·吉拉尔等法国学者一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综合思维探索，关心大众传播、嬉皮士的“反文化”和革命理念遭污染意识形态疲惫等现象，到圣迭戈后，开始撰写六卷巨著《思索方法》，延续近三十载。其间，他陆续出版了《社会学》、《科学与意识》、《电影与想象人物》、《自我批判》、《现代世界与排犹主义》、《加里福尼亚日记》、《奥尔良的喧哗》、《祖国大地》、《知识对话》、《知识沟通》、《人与死亡》、《超越启蒙哲学》、《构想欧洲》和《爱·诗·智》等五十余部著作，近年又发表了《世界向何处去？》、《走向深渊》、《为了进入二十一世纪》、《生态纪元元年》等对当今纷繁世态及其危殆的分析论述。2008 新年伊始，《向着文明政治》一书走出沉寂，又得以在“阿赫莱亚出版社”重版，法国各大媒体竞相评论。《传播》杂志出专号介绍埃德加·莫兰的当代社会学，突出他

关于事物纷繁复杂的观点和综合思维方式，与时髦的形式主义结构说不同（???）。同时，塞伊出版社再度发行了他的《思索方法》。

这种辩证观，是莫兰作为一位充分重视人类社会复杂性的人文科学学者超出传统社会学范畴和技术官僚成规，潜心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生态学规律，采用全面综合思索方法得来的。他不受封闭式科学的束缚，不相信有能解决一切的灵丹妙药，而将世界、人类、生活、知识和行动视为种种开放的体系，能够打开深奥和虚空的缺口，激发求知的焦渴。因此，哲学界将埃德加·莫兰比喻为希腊神话里的希西弗，但比那位徒劳无功的科林斯王幸运，继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安德烈·纪德之后，终于找到了进一步从多角度透视现实各个层面，既尊重个体和独特性，又将之置于其全面背景中考虑，从而避免支离破碎弊病的新思维模式。

埃德加·莫兰是一位赤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对弗·阿赫玛纳和吉·安格蒂尔两位法国记者说：“我渴求最基本的自由和兄弟友情，因而坚决反对剥削、统治和欺辱。”正因为如此，他今天受到世界上一切正直之士的景仰。

文明的异化与文化危机

埃德加·莫兰的《思索方法》分别为《自然的自然》、《生命的生命》、《知识的知识》、《观念》、《人道的人道》和《伦理》等六卷，从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多层面探讨日益严重的伦理与政治、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分析当今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伦理危机，和欧洲文化抉择中遭遇嘲弄的救世愿望，指出解决全球危机的唯一前景是实现传承与革新相结合的彻底转变。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书的导言里，他贬责今人的思维方式，说：“我们从此知道，自己并非处于黄金纪元的黎明，而近乎铁器时代，不是启蒙时世，而尚停留在思想的史前阶段。”他感到今天的思维模式肢解现实，让人陷入盲目和内心荒蛮，声称“我们目睹的是科学、技术、经济，包括消费和文化发展进程的表象，实为技术官僚社会学观占统治地位。我们不仅仅生活在一个出现文化危机的社会——这种危机在1968年达到了顶点。那时经济危机在外因作用下加剧，暴露出我们社会中潜在的内因——而且发展本身就包含危机性质。……发展的欲念

带来了我们现实的危机，其中有创造与破坏，进步与退化。透过令人欣快的经济技术形式表面看，这是现代技术官僚思想神话的破灭。因为，这种发展不是在文化与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再者，发展必然造成社会变化，即一种破坏，一个具有危机特征的瓦解和重组过程。”他进而认定进步与发展的理念是形而上学的抽象谵妄（???），将人引入了歧途，说：“信息、传播、知识、科学和神秘的破除在给人启示的同时，不也让我们步上了迷路！思想贫乏，但政治幻想丰富，导致了我们的灾难的悲剧”，“正在进展的全球危机关系到人类特有的命运。我们正被卷向灾难，让人联想到古生代末期生命的灭绝。”

面对文明的异化，埃德加·莫兰倡导“文明政治”，明确表示此论基于他对当今世态的“诊断”。他发现真理异化现象，目睹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正在全球扩张。可是，这一文明已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事实上，西方文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正面效果，急需进行根本性改革。否则，人类社会就要自取灭亡。他断言：“我们已经处于混沌之始。混沌可以是破坏性的，也可以是催生性的。或许，目前正是最终危殆（???）来临前的最后机会。”显然，他是在阐明黑格尔的哲理：密涅瓦之鸟总是在日暮飞行的。论及西方文明的负面结果，他说：“举科学为例：科学不仅带来了大量好处，也带来了大规模杀伤武器，提供了人造生命的可能。今天的技术和经济造成生物圈破坏，导致目下所有的生态灾难。”他强调：“必须来一次文明的革新……一些人获得物质利益，但心理和精神上并无真正滋养。相反，享受福利者难免心理苦恼。至于个人主义，它在独立自主和承担责任方面是个积极因素，但发展起来又导致了社会互助精神的消亡。”

关于社会文化，他着重分析从好莱坞发端的明星崇拜：“明星是一件十足的商品。他身上的每一厘米身段，每一根心弦，每一段生活回忆，都无不投向市场，在消费中增值，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特产。迷信与资本的重合绝非偶然，亦无矛盾，而是现时文明的两个方面。”可见，他是从一种危机感来看待美式大众文化在全球传播的。

埃德加·莫兰指出，当今消费社会中，一部分人消费过度，另一部分人消费不足。全社会群起追求纯物质福利，没有诗意般的生活，都为测时、度量和过度专业化费神。人们制造发展与进步的神话，殊不知二者全是相对的。发展未必带

来进步，可能适得其反，引发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等多种危机。进步可能是退化造成的不是人类福祉，而是精神与体质的祸患。实际上，西方人生活水准的提高已因生活质量的降低而坏死。

他具体谈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状况，说：“为复苏乡村，事实上要首先给村庄以活力，降低污染食品和地下水的工业化农业和工业化饲养业，以利于中小型农场的自然经营和最大量发展生态农业。至于城市，也离文明程度甚远。市郊渐成隔离区，那里的生活问题简直可怕。这同时也是大都会的问题，其中人群过度拥挤，同受毒化，环境恶劣，身心疾病日益流行。还有吸毒和服安眠药过度等等。我想，这两方面的问题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埃德加·莫兰认为，贯彻文明政治不在于转变方向，而要超越显出局限性的启蒙哲学，重新寻找一条道路，奔向另一个前程，从而实现根本转化，就像“毛毛虫蜕变成蝴蝶”那样。他摈弃放纵的经济自由主义。针对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宣扬经济增长的局面，他告诫制定计划者们切莫痴迷于增长，一味追求“更多”，而要着眼于“更好”，将人道置于一切规划的中心。依他看来，增长是个纯量化的概念，可幸福是无法量化的。当前所有的损毁皆由过度追求增长所致。眼下占统治地位的是追求数量，积成沉重的负面影响。

在他眼里，数量的增长只是一种表面进步，而一切进步都只能是局部和暂时的，冒进可能引起社会失衡。谈到当今西方社会，他说文化、价值、家庭、城市生活，乃至国家都面临着存在危机。在《爱·诗·智》里，他强调“文化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天性，而我们的天性在于文化。”一言以蔽之，鉴于任何文明都没能降服人内心的野蛮。而这种野蛮又在文明的核心，于人际关系中表现为一种伦理祸患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日益冷酷。他号召大众起而抵御心理上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这无疑是一种崇尚伦理与精神修养的呼唤。从这层意义上说，精神文化乃是我们时代的人类学体验和历史需求。

西方文明全球化的趋向

埃德加·莫兰称，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构思的文明政治概念“适用于世界所有出现西方化的地区，世界正经历着全盘西化的进程。西方人向过去被叫

做不发达的国家灌输了发展的概念。现今，在我们开始产生幻灭时，这些国家却蜂拥奔上此路。倘若灾难爆发，兴许会加速人们的觉悟。就象昔时没人相信生态学专家的警告，直至出现酸雨、海洋生物锐减、地球气候变暖等异常现象才开始警醒……我们在走向深渊。距离深渊足够近时，就会惊骇，故我们还有可能自救可那是没有保障的。”

埃德加·莫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感悟到生态问题，提出“生态伦理”和“和谐社会”的新概念，并将之与西方文明的全球化相联系。他为此特别指出：“圣保罗和上海这类特大都市，皆已达到跟西方同等的文明程度，需要进行同样的文明革新。”他追求“和谐社会”，并非要平定一切。在他心目中，“和谐社会”也包含差异、对立和生活艰辛。只是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社会互助和公民责任。

如上所述，埃德加·莫兰在深化卢梭关于“文明带来人类退化”的思想，又像美国思想家伊万·伊里奇和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一样，弃绝普世主义，对西方文明模式提出质疑。他说：“整个西方都侧重发展了文明的物质和技术方面，却没能足够培养，乃至忽视了心灵、精神，及人与自身和与他人关系等内向探索因素。在这一点上，可以汲取其他许多文明所提供的最佳营养。例如中国，那是基于道家的文明，一种非常丰富的生活与自然观和智慧理念。”埃德加·莫兰注意到，现在欧洲渴求生存艺术，正从佛教禅理和印度瑜伽中寻找他们渴望医治心病，改变生活状态的答案。他还赞赏北美和亚马逊地带印第安人的文明，称他们能理解人与自然的相联关系，以此对待水与森林，很值得西方借鉴，以将不同文化的美德汇合起来。

在《思索方法》第六卷“伦理篇”里，他着重分析了当代西方伦理，认为欧洲文明提出民主与人权理念，从中世纪的纯基督教意识演化为现代世俗的人文主义。但是，西方的价值观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各国都有自己内部的深层特征应当自主解决问题，不可摹仿自身尚需改革的西方模式。西方更不可滥用会导致种种冒险的干预权。莫兰反对暴力，不赞同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自1993年以来鼓吹的“文明冲突”，更不愿这种冲突引发西方与东方伊斯兰全球大战，而寄希望于文明“共生”，期待文明政治的取向获得实际体现。他推崇伊里奇关于“至善的腐化导致极恶”的论断，确信“舍弃红尘非绝清平世界之念”；

“不可能者，终归可能”。关键在于遵循先哲帕斯卡尔的格言：“勤于思索”。年轻时，他只有一种人类大同的抽象概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不断思索深切懂得了“人类的一致中包括个人与文化的多样性，而多样性构成一致。人类的复杂性在于，差异里有一致，一致中有差异。”

尚待证实的预见

对于埃德加·莫兰的《思索方法》和文明政治思想，反对者向来有之，现时更不乏其人，叫嚷其艰涩难懂，让人一头雾水。一些乐观派则实难苟同他辩证的发展观，认为是危言耸听，制造惊慌，甚至将其斥为学术“诈骗”。仅就生态问题一项来说，一些科学家坚持地球变暖系由太阳剧烈活动所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温室现象与CO₂的释放有什么直接联系，而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几乎可以略去不计。他们觉得一些人纯凭假想向未来投射模式化的生态阴影，是出于政治需要，为此以预言家自居，通过电视传播又一部“新约全书”，宣告世界末日到来，使群氓产生负罪感，以便于制伏。更有一些精明研究者利用这一新宗教的媒体鼓噪，获得数十亿美元预算经费，其实都是故弄玄虚，无非一整套欺世伎俩。

然而，埃德加·莫兰当不属此类。他对当今文明，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诊断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鸣，因为人人皆对眼下社会现实有自己的感觉。况且，埃德加·莫兰并不是一个悲观厌世者。他生性达观，待人温和，是个热爱生活的现实乐天派。他在答《世界报》记者问时说：“充分认识一切人类世态的不测风云和悲剧，远没能使我走向绝望。相反，从风险里夺取精神安全，争得机会，会让人精神振奋。万物景象头绪纷繁，呈现多重真相，势必会激起热情。人们最终会理解我的。跟我一样，他们在封闭思维、封闭科学、狭隘、残缺和妄言的事实里感到窒息。必须永远摆脱那种自称诠释一切的金科玉律，让人喘口气。”他还对《新观察家》杂志社长让·达尼尔表明：“尽管进步的概念作为历史规律已经消亡，我仍然相信人类进步的可能。”

埃德加·莫兰冷静展望人类的未来，清醒地说：“我们的希望，是黑夜里的火把，没有耀眼的光芒，只是个黑夜里的火把。”纵观人类文明史，从但丁到巴尔扎克，一些思想界巨匠无不对所谓的人类“发展”与“进步”提出过质疑，

一个个逆时代潮流而动，被划为“反动世界观”。十九世纪后半叶，波德莱尔早就批判过工业社会的功利主义，兰波毅然离开依此模式发展起来的“西方沼泽”，乞灵于东方文明。今天，埃德加·莫兰提出“全球化唤起整体思维”，实质上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是中华大观哲学的现代版。笔者相信，历史的现实进程终将证实古今这一先知流派思想家们的预见。